

黔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回顾黔南的解放 (转载)	金 凤 (3)
忆福泉 (平越) 解放	李 耀 (21)
回顾长顺解放	王升三 (31)
回忆解放荔波	杜介厘 (48)
记解放都匀城	史炳林 (57)
龙里县的剿匪斗争	张一凡 (61)
解放黎、榕、从和剿匪战斗	杜书华 (76)
回忆接管三都	董 一 (89)
土匪叛乱与灭亡	
记三都解放初期剿匪情况	韦有康 (107)
独山上司区剿匪斗争片断	张润芝 (118)
在下司剿匪的日子里	王 霁 (127)
忆基长剿匪点滴	谭子升 (135)
接管平浪和击退土匪的三次进攻	杜书华 (141)

福泉县“黎山事件”的前前后后	杨铁城 (148)
雅阳寨歼匪记	朱慕文 (162)
奔袭四寨	于世岭 (175)
茂村之战	时念法等 (178)
大破“双鼻洞”	朱中和 (184)
荔波人民游击队的组建和战斗历程	潘文兴 (188)
九歼游击队抗击陈与参匪部围攻的七天七夜	石国义 (214)
起义部队八十九军三四三师两个团的叛变及其覆灭	王化棠 (219)
二支队组建始末	顾汉臣 (225)
匪首蒙健漏网、落网记	蒙明儒 (230)

回 顾 黔 南 的 解 放

金 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前身是都匀专区，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称为独山专区。这里群山起伏、溪流纵横、幅员广袤，确为布依、苗、侗、水、瑶等兄弟民族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数千年来，他们与迁徙到这里的汉族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了山区，从而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但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各族劳动人民却世代挣扎、呻吟在反动统治的重压下，生产十分落后，直到解放时还有许多地方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经常以糠菜、蕨根充饥。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第一次获得了平等地位，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发展了经济，改善了生活；并在一九五六年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从黔南地区解放前后的历史对比，雄辩地阐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初期，党派我在黔南地区工作，与各族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艰苦而复杂的斗争，也共同欢庆了各族人民的翻身。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解放初期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不禁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同时，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斗争，使我深深体会到：各民族的

紧密团结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特扼要地记述下来，借以表达我对那一段岁月的怀念。

一、进军贵州 解放黔南

一九四九年四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四月下旬，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接着，江南的广大地区也先后获得解放。这时，徐运北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到达了江西省上饶，成立赣东北区党委。当时，我在上饶地委工作。不久，二野五兵团奉命进军西南，解放贵州。赣东北地区党委奉命将地方工作移交给方志纯同志，由原来南下支队的干部，与在江西等地参加革命的一批青年学生共同组成西进支队，随五兵团进军，作接管贵州的准备。进军途中，在湖南邵阳，新的贵州省委开会确定接管贵州的部署，到达芷江，宣布了各大队负责接管的地区。这时，我从二大队调到新组成的九大队，其中有由部队转业干部组成的五个县委的架子，准备接管独山专区。省委派况玉纯同志来主持这一地区的工作。

国民党贵州省的独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独山县城，下辖独山、都匀、平塘、荔波、三都、平越、丹寨、麻江、罗甸、黎平、榕江、从江共十二个县。这里与广西接壤，是贵州省内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

我是山东人，一向在北方工作，对西南各民族的情况茫

然无所知。为了做好到民族地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在江西、湖南时，赣东北区党委和五兵团政治部就印发了一些有关贵州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我还找来一些报刊杂志阅读，想从中多了解一些关于各民族的情况。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持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观点，文章中掺杂了许多民族歧视以及侮辱性的内容。但从字里行间还是了解到一些关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等。这些零星、片断的知识，对于我后来到黔南民族地区工作，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五兵团从湘西邵阳出发，沿湘黔公路向贵州前进。十一月三日，部队进入贵州境内，接连解放了玉屏、天柱、镇远、黄平等县城。按照兵团的作战部署，十七军五十一师转向贵州南部进军。十一月十三日，五十一师一五一团解放了麻江县城，随即由副团长黄幼衡同志率一个加强营，沿公路向都匀挺进。当部队到达距都匀县城十余公里的杨柳街时，截获国民党县长都堪打给乡公所的电话。黄幼衡副团长立即命令部队分两路跑步前进，包抄都匀县城。十四日夜，我军在火车站、大桥处与敌哨兵接触，随即突进城内击溃了敌军。国民党都匀县长都堪惊惶逃走，至十五日凌晨，城内敌军已全部肃清，都匀宣告解放。

都匀是贵州南部军事重镇，自明代设府以来，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各族人民，在此驻有重兵。清末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农民起义军曾与清军在此进行过多次激烈的争夺战，三次攻陷都匀府城，声威大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都匀办有炮兵学校，解放战争

末期，又将四十九军二四九师及宪兵五团、十二团等部队驻扎都匀。为了抗拒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又在都匀策划部署应变计划，妄图凭借黔南山区开展反革命游击战争，将担任过军职的都堪、王仲三等反动分子于解放前夕派回都匀，分别充任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他们在都匀组织了“军警宪联合办事处”、“反共保民委员会”以及“防护团”、“防剿队”、“民众自卫队”等等反动组织。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苦心经营，都为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由于都匀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控制黔南、黔中的军事要地，因此，解放后，上级决定将地委、专署机关及五十一师师部设于都匀，随后又成立了军分区。在名称上暂时沿用独山专区的惯称，至一九五二年才改称都匀专区。

都匀解放后，张欣如同志从贵阳带领四个县委的架子来到黔南参加接管工作。此时，中共独山地委亦正式开展了工作，由况玉纯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张欣如（专员）、方士新（地委宣传部长）二同志为委员。不久，赵振邦同志由麻江县委书记调任地委组织部长。第一届中共独山地委即由上述五人组成。

解放都匀县城之前，部队已先解放了平越（今福泉）、麻江两县城。都匀解放后，部队沿黔桂铁路南进，解放了独山县城以及黔桂交界处的重镇麻尾。荔波县少数民族的进步人士潘文兴、覃杰等同志，在我党影响下组织了“荔波人民武装游击队”，于十月十五日一举占领了荔波县城，并与我们取得联系后，宣告荔波解放。十二月，部队先后解放了平塘、丹寨、三都三座县城。一九五〇年元月，榕江、黎平、从江三县亦宣告解放。至此，独山专区除罗甸外，均已

获得解放。

二、执行政策 进行接管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贵州，国民党残余部队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而未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全省大部地区即顺利解放。但这种表面上的顺利并不表明敌人已经甘心失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独山专署所辖各县的党政机关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一般都是裹胁一些人员，席卷城内的武器、金银及重要案卷撤离县城，逃窜到边远山区潜伏，待机进行叛乱，妄图死灰复燃。这是蒋介石、谷正伦在大崩溃前夕苦心部署的“应变计划”的一个步骤。据我军所获情报，如：解放前，国民党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陆荫揖曾密令各县：“为加强民众自卫力量，适应全面剿匪战争，经拟定本区《自卫队对匪作战（游击战）指导之研究》”。都匀县拟定了“空室清野及保安寨实施办法”，妄图实行“三光”（搬光、走光、烧光）政策，达到饿死和“困、扰、疲”我人民解放军的目的；同时还策划搞“保安寨”，以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阴险手法与我长期对抗。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西南区专员肖崇辉（化名柏家华）从重庆潜回都匀，建立了潜伏的特务小组。国民党中统也在都匀设立了调查室。同时还有国民党湘桂黔铁路特别党部督导室领导的“都匀分区”、国民党内政部领导的贵州通讯处黔南督导区、国民党中央社黔南特派员等等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又如国民党独山县政府解放前夕制定的“应变方案”中规定：“举行反共宣誓，表明剿匪反共决心”；

“全县文武人员分组工作，实行党政下乡”。他们还提出反动口号：“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毁家保家”。在策略上他们一方面要与恶霸、豪绅、惯匪“结成一坚强反共战斗体”，另一方面又强行将各族人民编为“游击小组”。国民党独山县政府还将其机关人员全部编入保安团；将“自卫队”编为三个团，设立了三个指挥部，妄图凭借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我顽抗。他们在撤离独山县城前夕，野蛮地屠杀了六十多人，制造白色恐怖，并且宣布：“擅自回城者杀，向城内运送物资者杀，进城做生意者杀”。这些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应变方案”。正是由于敌人的这种阴谋部署，因而在接管之初大多是面临着一座空城。如独山县城内原有国民党大小机关四十六个，大部机关在接管时都是一座空房。

针对敌人“空室清野”的阴谋，我们在接管工作上，首先展开了政治攻势，派干部下到农村集镇，利用赶场天向广大群众宣传《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以及我党的各项政策，揭穿敌人的种种污蔑和造谣，号召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解除顾虑，归向人民。除进行广泛宣传外，我们还通过一切关系，进行个别动员、争取。经过我们大量宣传、争取，绝大部分旧人员看清了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于是纷纷返回县城向我接管人员报到。如原都匀县茶场乡乡长蒙光辉，解放后留任乡长。由于他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努力配合我政府完成粮食借征任务，并为我方担任水族语言翻译，报告匪情等，后被我县人民政府委任为王司区副区长，县民政科副科长等职务。又如麻江县国民党县长解放前夕带一部分人枪逃到龙山乡，县城解放后，我方打电话给龙山乡长，反复交代政策、说明

利害，要他去争取旧县长返城。三天后，旧县长返回县城，带回人枪八十多，并有机关枪四挺。对待旧政府人员，我们一律不打骂、不侮辱，开诚布公地交代政策，以礼相待；同时组织他们学习《约法八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变立场，与旧政权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给以出路，安排适当工作。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团结、改造旧人员的政策，争取团结了旧人员中的多数，孤立了极少数顽固不化、反动到底的分子，从而促进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接管工作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思想进步的地方士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协助。如平塘县进步人士张仲孚老先生，为了争取县城的和平解放，曾亲自去说服国民党平塘县长杨端楷，要他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归向人民。杨端楷拒绝投降，带领人枪撤离县城，张老先生又立即派人与我军驻独山部队联系，终于使平塘县城得到和平解放。县城解放后，张仲孚先生出任支前治安委员会主任，积极协助我军动员旧党政人员归来，并协助征收公粮、收缴武器等。当黔南主要县城解放后，其余各县要求我们派干部接管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接管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狡猾的敌人混入支前治安委员会这一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与我们周旋，而实际上是探听我们的情况，侦察我们的虚实，伺机而动。如平塘支前治安委员会中就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土匪暴乱，围攻县城。对于这种情况，由于我们事先有所警惕，保持戒备，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有的敌人利用合法身份，用糖衣炮弹的方式向我们进攻，他们采用吃喝拉拢、金钱收买、美女腐蚀等手段，向个别意志薄弱的干部展开攻势，当时也确有极个别的干部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犯了

严重错误，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黔南是少数民族人民聚居地区，能否取得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是我们开辟民族地区工作成败的关键。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由于长期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素来对一切“汉人”都是疑虑重重、心怀戒备的。我们进入黔南这一民族地区后，首先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少数民族人民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一家人的兄弟关系，历史上的民族隔阂是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并揭露、批判了国民党民族政策的反动性。在行动上，我们的干部切实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还教育干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号召干部努力学会少数民族语言，主动接近少数民族人民，鼓励干部与他们交朋友。由于我们的干部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的干部作风朴素，生活艰苦，工作热情积极，确实表现出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高尚风格，因而给了少数民族人民以良好的印象，他们把我们称为“新汉人”，对我们备极拥护与信任。

黔南的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解放初期在各个少数民族内部大多还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在个别边远地区甚至还保留着氏族社会制度，寨老、族长等少数民族中的自然领袖在本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极大的权威。因此，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就成为解放初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回顾当时我们对党的这一政策的理解还是正确的，没有简单地对待民族问题，而是大力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如解放初期，省委领导同志就亲自写信给独山县布依

族中的上层人士莫凤楼先生，动员他与我党合作。莫凤楼先生解放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顾国民党匪特的威胁与利诱，他于接信后，主动与我军部队及地委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民主建政与剿匪治安工作，安定地方秩序，稳定人心，积极协助收缴枪支，并带头缴纳公粮。他的进步行动在独山布依族人民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当地（麻尾区）四个布依族莫姓的旧乡长都消除了疑虑，返回乡公所协助我们进行接管。莫凤楼先生的进步行动遭到敌人忌恨，后来他全家四十三口竟遭土匪杀害，光荣牺牲。又如平塘县原国民党西凉乡长陆镇藩（布依族）先生，接到张仲孚老先生的信后，毅然归向人民，立即组织当地群众运送了七千多斤大米，支援县城的驻军。他还积极协助我军和政府收集土匪情报，协助我军剿匪。在土匪围攻平塘县城的危急时刻，他驻守在北门碉堡内，与我军失去了一切联系，面对土匪围攻的威胁，他毫不动摇，对我军和政府有着坚定的信仰。陆镇藩先生这种革命行动在当地布依族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独山专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被选举为独山专区副专员。还有水族知名人士潘一志先生，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解放前弃官不做，归隐山林务农；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县长登门拜访，诚挚邀请，他欣然从命，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为了表示他一心跟着共产党走的态度和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益智”改为“一志”。

现在回顾起来，党的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一政策不仅是团结几个民族代表人物的问题，而且通过他们表达了我党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重视，体现了我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黔南地区解放、接管工作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民族地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心环节，它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发动群众 消灭匪患

贵州的剿匪斗争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与垂死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生死搏斗，其斗争的艰巨性并不亚于解放战争中的重大战役。由于我们在剿匪斗争中紧紧地依靠了贵州各族人民，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实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消灭了全省近三十万土匪，彻底根除了贵州历史上的匪患，给反革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和各族人民的翻身奠定了基础。

黔南地区的剿匪斗争是从一九五〇年元月开始，至一九五一年七月结束，据独山军分区统计：我剿匪作战共九百多次，歼匪三万零六百余人，缴获各种炮五十余门，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余挺，长短枪一万七千余支。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部队还大力进行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召开各种群众会二万八千三百多次，帮助群众砍柴五十三万多斤，担水三十四万多挑，收谷二万七千多次；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八千二百八十多个，发展农协会员十一万九千九百多人，组织民兵一万零九百多人。

黔南地区的匪患猖獗，是国民党反动派按照其“应变计划”加以组织和部署的。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预感到末日将

临，但又不甘心灭亡，便妄图将贵州经营成为他们最后抗拒解放和“反攻”的根据地。他们在贵州成立了十九兵团，扩充地方保安团，开办“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反动骨干，同时还将一大批国民党的中高级反动骨干派回贵州省各自的原籍，掌握党、政、军大权，策划与我长期对抗。在黔南地区，此类人员就有肖树经（国民党军少将、国民党独山专区专员）、都堪（国民党军少将、都匀县长）王仲三（国民党都匀县党部书记长）车祖瑜（国民党军少将、国民党独山县长）等一批反动骨干。如都堪于解放前夕即将其实力拖出潜伏于都匀内外套地区，解放后即打出了“黔东南绥靖区”的土匪旗号，公开进行武装暴乱。

一九五〇年春黔南地区的主要股匪有：盘踞在都匀、贵定交界处的匪“黔南保安部队”王仲书部、匪“中国人民自救军”王仲三部、匪“都贵麻反共集团军”潘志平部；盘踞在平塘、独山一带的匪“黔桂边区国民党讨共救国军”王忠诚部、匪“黔南游击军”黎方蔚部、匪“黔东南绥靖区”都堪部、匪“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赵达之部；盘踞在平越（今福泉县）地区的匪“中国反共军西南第一游击军”戴树奇部；盘踞在荔波的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司令部”陈与参（国民党广西省宜山专署专员）部；以及盘踞在黎、从、榕三县的匪“湘桂黔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杨锦标部等。此外还有一些股匪不时从外地窜扰黔南，以及境内许多零星股匪。

记得我是在榕江县度过了一九五〇年春节的。正月十五，我和几位同志乘坐小木船从榕江湖都柳江而上，小木船在湍急的江水中行驶了三天才到达三都县城。一路上我们饱

览了都柳江两岸的壮丽风光，漫谈着这一带的民族风情、历史掌故，还畅想着将来在这条江上将会建起巨大的水力发电站……我们心情都十分轻松、舒畅，完全没有料想到大规模土匪暴乱的阴云，已经弥漫在黔南的上空。

我们到达三都县城的次日，就遇到了数百名土匪围攻县城。土匪提出的口号是：“不缴粮、不铲烟（鸦片）、进城抢东西”，他们纠集了一批惯匪、散兵，并以谁不参加攻城，谁就缴全部公粮为威胁，胁迫一些群众参加围攻县城。经我驻军及全体干部英勇反击，打退了土匪的围攻。自此以后，黔南各地土匪暴乱纷起，四处攻打我区乡政府，围攻县城，断绝交通，劫掠国家和人民的财物，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匪风最猖獗的时候，我们根据省委、省军区的指示，暂时主动撤离了荔波、黎平、榕江、从江四个边远县份，集中力量控制中心地区的七个县。

黔南地区匪风特别猖獗的另一原因，就是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一部分叛变，参加了暴乱。原国民党军一部在黔西地区宣布起义后，其中一部分调至瓮安、平越一带进行整训。由于潜伏在起义部队中间少数反动分子的煽动，并勾结当地豪绅，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在瓮安县城、瓮安草塘和平越牛场，发动暴乱。我瓮安县人民政府被迫撤离县城。此后的一段时间，原独山专区的东南西北，四面皆匪，我政府和部队仅驻守在几座县城和主要交通线上，这是黔南剿匪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一个时期。

一九五〇年三月，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剿匪为中心任务，并决定实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方针，会议要求全省党政军民

全力参加和支援剿匪斗争。会议还决定集中全省的机动部队组成了东、西两个集团，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重兵进剿。

一九五〇年六月，贵州军区东集团剿匪部队在黔南、遵义两地区交界处，组织了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剿匪部队首先拉开大网从四面八方将这一地区严密包围，主力部队向匪部盘踞的中心据点突袭，将匪部击溃后，又分兵三百二十路四处搜山、兜捕溃散匪众。这是贵州省内首次铁壁合围战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在历时二十天的战役中全歼叛军匪“三二九部队”三千多人，活捉匪副司令王福堂。

十月，东集团又组织了都（匀）、贵（定）、麻（江）合围，歼灭潘治平匪部六千多人。十二月组织都（匀）、独（山）合围，歼灭蒙永奎匪部三千九百多人；接着又组织了惠（水）、大（塘）、通（州）合围，歼灭王忠诚匪部七千余人；同时又举行了黎（平）、从（江）、榕（江）合围，歼灭石竹修匪部五千余人。一九五一年元月，又组织了荔波合围，全歼陈与参匪部八千余人。三月，罗甸合围全歼陈秀清匪部一千多人，解放了罗甸县城。到七月初，我军解放了册亨、望谟二县后，全省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在黔南地区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出了重大的、主要的贡献，他们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在各处的战场上歼灭了土匪的主力，使土匪闻风丧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还一身兼任了战斗员、工作员、宣传员，在战斗的间隙中，大力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种田、收谷、砍柴、挑水，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勤恳地服务，不

愧为各族人民优秀的子弟兵。他们在剿匪斗争中所创立的伟大功绩，将永远铭记在黔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地方党政干部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敌众我寡的险恶环境中不畏艰险、斗争坚决，同时紧密地依靠各族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批参加西进支队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我党的许多老干部的带领和培养下，继承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剿匪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了。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某些弱点，学习老同志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大都成为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各族人民群众的参加和积极支援，也是剿匪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他们有的参加了民兵组织与土匪进行战斗；有的积极为我军带路，送情报，还以大量粮食、物资支援我军战斗。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和事迹。如平越县凤山镇四保联防队的五十一名民兵，在一次与近百名武装匪徒的战斗中，毙匪四十名、伤十名，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而我方无一伤亡，创造了民兵以少胜多的出色战例。又如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千多土匪围攻我都匀县王司区公所四天三夜，我驻守干部、战士仅三十多人，形势十分危急。这时，阳和、基场的少数民族民兵闻讯赶来解围，配合驻守部队将土匪击溃。

在黔南的剿匪斗争中，许多优秀同志为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师一五三团三营营长张传书同志和万副营长在奔袭茂村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平塘县通州区区委书记姚

林彬同志，在得知邻区牙州被土匪围攻时，他率领不多的同志驰援，在与土匪的激烈战斗中，他与其他四位同志英勇牺牲。其他英勇献身的同志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勋绩永垂不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限于篇幅，我不在此一一列举出他们的英名，谨以此文向为黔南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们致以深挚的悼念。

四、各族人民 喜庆翻身

一九五〇年八月，剿匪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了第一届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全省开展反封建斗争的部署。这次会议决定：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始，首先在全省中心的四十六个县，近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的五大任务。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就在全省大部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九五〇年十月，黔南地区尚有荔波、黎平、从江、榕江、罗甸五个县为土匪所盘踞，因而首先在中心地区的都匀、独山、平越、麻江、三都、平塘、丹寨七个县开展了五大任务。在干部力量的组织方面，由地专机关和军分区抽出干部六百六十四人，包干都匀县，省委工作团干部九百人，包干平越、麻江二县，西南革大派了二百多名干部到独山，其余各县由县机关和部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奔赴农村反封建斗争第一线。

五大任务的开始阶段，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培养、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做好反封建斗争的思想准